

质量安全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意义、挑战与路径

廖丹子, 诸葛小雪

(浙江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来看待质量安全,质量安全就是一国或一个区域不因质量问题而面临发展困境并具备通过质量发展而有能力保障国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整体状态和综合能力。目前,我国总体质量安全存在“质量失信”“质量失衡”与“质量失合”三大质量安全“赤字”问题。新时代应基于新发展格局的总愿景,将质量安全纳入新发展格局通盘战略,推进质量安全行动,强化国家质量技术基础设施,推动质量安全共治,通过质量安全组合拳,增强质量安全优势,为我国人民提供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加优质的“中国质量”。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质量安全;质量共治;中国质量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3)03-0110-10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3.03.012

Quality Safety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ignificance, Challenges and Paths

Liao Danzi, Zhuge Xiaoxu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viewpoint, quality safety is the global state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a country or a region not to suffer from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due to quality problems but to have the ability to guarante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through quality development. At pres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three "deficits" in China's overall quality security, namely "quality credit inadequacy", "quality imbalance" and "quality dispersal".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overall vis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e should incorporate quality safety into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promote quality safety actions,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quality infrastructure, promote the quality safety co-governance, and enhance its advantage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quality and safety to provide the public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rowth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more optimum "China quality".

Key words: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quality safety; quality co-governance; Chinese quality

收稿日期:2023-01-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176);浙江大学重大战略研究智库项目“统筹发展与安全战略研究”

作者简介:廖丹子(1983—),女,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非传统安全、国门安全研究;

诸葛小雪(1999—),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门安全。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要求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这是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建设“质量强国”的又一次围绕发展质量的重大战略部署。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反复要求把发展的立足点从速度和规模转移到质量和效益上来,实施质量变革和质量提升。然而,我国内外“质量赤字”问题依然突出,这与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格局的整体要求存在落差。新时期,要瞄准质量安全提升的现实紧迫性,找准质量赤字的节点,推动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格局,不断增强发展的安全性和主动权。

一、质量安全: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

一方面,国家安全是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格局的条件和保障,而质量是国家安全的基石。

安全是一个国家稳定的基础和发展的前提,是国家开展各项活动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安全始终是党和国家关注的焦点,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始终贯穿党的工作全过程。进入新时代,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之间竞争日益激烈,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盛行,国际社会存在诸多影响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因素。我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1],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内外风险交织叠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一般认为,“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

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44年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US Foreign Policy)一书中。二战后,“国家安全”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常用概念。对“国家安全”概念的理解纷繁众多,争论也时常发生,以致于“国家安全”被认为是社会科学中“最不明确和价值负载最多的概念”^[2]。整体来看,对国家安全内涵的理解主要有四种:一是“状态说”,即认为国家安全就是指国家没有内外危险和国家利益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3-5]。二是“能力说”,即认为国家安全是保持国家统一完整、免受内外部破坏和维持安全心态的能力^[6-7]。三是“行为说”,即认为国家安全是对国家安全利益持续性追求的行为^[8]。四是“要素说”或“综合说”,即将国家安全视为若干重大安全领域、议题或利益的共同构成,如认为是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生态、社会、文化安全的总和^[9],或是一种主客体关系中的状态、能力和行为的总和^[10],或是“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及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①因此,我国法律、政策和学术意义上的国家安全蕴含状态、能力、行为和要素四方面,既包括军事、政治、外交、国防等传统安全领域,也包括食品、生态、科技、网络、生态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是“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11]。

从总体国家安全观来看待质量安全,质量安全就是一国或一个区域不因质量问题而面临发展困境并具备通过质量发展而有能力保障国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整体状态和综合能力,其基本矛盾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质量安全需要与质量安全保障能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质量是衡量产品、服务、环境、科技、教育等所有领域之内涵的共有元素,一个国家的总体质量安全应该由各个行业、领域和区域的总体质量安全的总和与结构来衡量。获得更好的质量安全体验,首先是社会大众的朴素追求,是一个关

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公共问题,还关乎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关乎国家安全、国家文明与国家形象,^②同时,国家安全具有极高的政治性、极广的涵盖面和极大的权威性,因此在价值次序、资源分配、权力支配上占有优先和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质量安全对国家安全的作用也就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是国家安全的基石^[12]。质量安全提升切中了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的主脉。

另一方面,质量安全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力抓手,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有力保障。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和“美好生活需要”的认定及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定,是新时代依据党和国家事业的全新业态而作出的从根本上决定决策方向和发展重点的重要判断。

“不平衡发展”是指不同主体对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果的获得与受益的不均衡、不均等、不平等,主要体现为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平衡、发展领域不平衡等。“不充分发展”是指各个领域的改革与建设虽日益深化,但与人民美好需要相比还不彻底、不及时、不完全,与应有目标和国际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产品、食药、教育、医疗、环境等基本民生领域公众满意度偏低,以及科技、服务、品牌等发展领域的公众认可度较低就是不充分发展的例证。“美好生活需要”既包括财富体量、成果规模的总数考量,也包括品质、品牌、健康、安全、美观等的内涵考量;既包括经济财富、物质成果等物化方面,也包括政治、文化、社会、教育、环境等人文方面;既包括天蓝、水净、食安、稳居等生存性需要,也包括公平、正义、民主、参与、尊严等发展性和价值性需要,还包括趣玩、雅妙、舒适等享受性需要。新时代的人民需要

整体呈现出由一元化的生存性“硬需要”转变为多元化、品质化的发展性、价值性和享受性的“软需要”,并具有不同对象的差异性和整体状况的发展性。“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无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矛盾”,则集中表现在发展总量持续超前、增长速度持续领先和公众的生存性需求整体得到满足,但公众的发展性需要、价值性需要和享受性需要还得不到有效满足。

主要矛盾对事物的变化发展具有主导、支配和决定作用。质量供给直接关涉日常生产和生活,具有极广的涵盖面,深化质量安全战略及其实施,符合公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向往。高质量发展旨在合理分配资源和利益,化解因利益而引起的矛盾与冲突,准确认识质量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容,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起点。质量安全的程度直接体现着党执政的绩效和能力,在价值次序、资源配置、政策拟订上具有优先和主导地位,提升质量安全的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切口。

通过什么途径推进高质量发展,是近年来党中央的主线战略问题。2023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的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可以说,质量安全提升是国家安全能力提升的基础条件,其蕴含的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符合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

二、中国质量安全的三重“赤字”

“质量赤字”是质量供给无法满足质量需求的社会现象。严重的“质量赤字”会减损社会福祉、削弱政府公信力和触动国家核心利益,全球化背景下还会损害国家形象、影响国际外交。当前,我国质量安全的“赤字”主要表现为“质量失信”“质量失衡”和“质量失合”。

(一)“质量失信”危机凸显

“质量失信”,即质量终端消费者对质量供给的不信任、不认可,这既表现为社会公众对质量供给方(如经营性企业、非盈利组织等)的不信任、不认可,也表现为监管方(如政府、媒体、第三方等)对质量供给的不信任、不认可。

2013—2022年,“质量”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其反映了公众与公共部门对质量问题的集体聚焦。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质量安全的研究热点进行了关键词共现分析(如图1所示)。^③图1显示,质量安全的研究对象广泛,涉及农产品、乳制品、水产品以及供应链和区块链、政府监管等主题,其中“质量安全”“农产品”和“监管”节点最大。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需求已经从过去“有没有”产品转到产品“好不好”上来,产品质量已成为公众的重要考虑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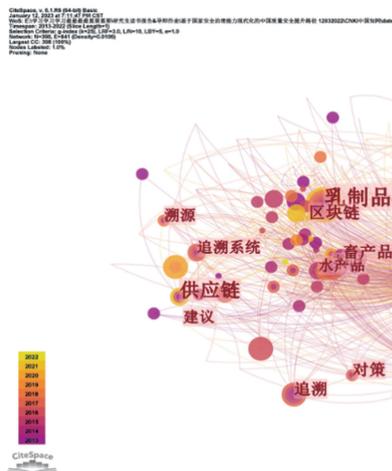


图1 2013—2022年质量安全研究关键词共现分析

与此同时,质量安全问题也引发了“质量失信”危机。据估算,我国制造业每年因质量问题而遭受的损失高达1700亿元人民币^[13]。2015年至2020年间,我国食品监督抽检批次逐年增加,但食品安全指数仍未突破307^[14]。我国民众需求的“以脚投票”也生动折射出了“质量失信”的现实:2018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49亿人次,境外消费超1300亿美元^[15],

2019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55亿人次^[16],出境游客境外消费超过1338亿美元^[17],主要集中在厨卫、美容保健、儿童玩具、衣裤鞋帽等日用消费品领域。而与此关联的质量投诉居高不下:2020—2021年,我国消费者协会每年受理的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合同问题、质量问题占投诉总量的七成以上,其中质量类投诉分别占比20.65%和20.00%,虽然2021年质量类投诉数量有所下降,但仍占较高比例^[18],且远程购物、邮政快递、跨国跨境旅游与消费及海外代购投诉持续攀升^[19]。

此外,“中国质量”在国际场域中也显示出较大“失信”问题。国家外文局一项全球调查表明,高达62%的国外受访者担心中国品牌的质量问题,出口商品连续多年占据美国、欧盟通报召回问题数量的首位,如占欧盟通报召回的比例,2006—2012年分别为48%、52%、57%、60%、58%、54%、58%;占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通报召回的比例,2008—2013年分别约为54%、52%、51%、61%、52%、70%^[20]。2008—2015年我国出口工业品退运量居高不下,近2/3是出于产品设计、安全、卫生、环保等方面的质量问题,从而引发了国外“劣质产品中国造”的负面舆论,给“中国制造”带来诚信缺失和市场流失。

(二)“质量失衡”矛盾加剧

“质量失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的总量与结构、效益的失衡。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从整体上看,我国在制造、服务、工程、环境等领域的质量供给规模庞大,但其中能称得上好品牌、高品质的却较少,中高端质量安全供给明显不足。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分别高达101.5万亿元人民币和32.22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前列,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2020年我国粗钢产量突破10亿吨,排名世界第一^[21]。截至2022年6月,中国

网民规模达 10.51 亿^[22]。

然而,在总量超前、速度领先的背景下,内在结构却存在较大问题:产业结构失衡,低端产能严重过剩,而高端产能严重不足,且制造企业的服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不到 10%^[23];城乡发展失衡,2021 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的 2.50 倍^[24],截至 2022 年 6 月,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异为 24.1 个百分点^[25];区域发展失衡,到 2020 年,东部地区名义 GDP 为 56.6%,中部地区为 26.3%,而西部地区仅为 17.2%^[26],东部地区进入品质消费阶段,而西部地区仍处在满足基本生活阶段;领域结构失衡,相比之下,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就,而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生态等领域的有效发展则明显滞后;人与自然关系失衡,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此外,增长速度快却增长效益低,速度与效益失衡。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测算,由于劳动力转移、人力资本增速放缓、投资率过高等原因,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从 1995—2009 年的每年 3.9% 下降到了 2011—2015 年的每年 3.1%^[27]。此外,国内质量与国际质量不相称、不匹配。从全球价值链来看,中国品牌、技术、标准及其话语权的缺失与我国经济体量超大、发展速度超快极不匹配。数据显示,3 万余项国际标准中由我国主导制定的仅占 0.5%,新兴产业的技术规则几乎全由西方国家掌控^[28]。中国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中低端水平,整体品质低、创意少、标准乱的现状未有根本改变。

(三)“质量失合”问题突出

“质量失合”是指在质量安全供给中缺乏基于多方主体协同的质量安全共治。质量安全的政府管理、市场机制和社会主体综合作用的产物,政府、市场和社会在质量安全供给中各有自身优势和功能空间。然而,三者合力仍存在实质阻碍。

一方面,政府、企业与社会的质量安全认知各有缺失。从政府方面看,GDP 目标仍然是地方政府的首要牵引力,质量安全监管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言行悖论”,质量领域中的言与行、供与需、生产与消费、国内与国外不对应的“质量悖论”现象十分普遍^[29]。同时,企业的质量主责意识不足、公民的质量权益意识薄弱,企业在质量安全中的主体责任地位实际上并未真正确立^[30],公众主观上的质量权益意识还未形成全社会性的质量行为自觉,公众的质量知识欠缺、消费者在消费前收集信息的主动性很强但事后解决问题的主动性较弱^[31],大多数质量投诉都属于被动行为,且大多本应采取质量维权行动的却往往因为维权成本太高或渠道缺乏等原因而无声放弃。

另一方面,政府、企业与社会对各方的质量安全职责存有认知抵牾,缺乏主体间认同。政府认为,质量问题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其根本在于市场,政府能够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加以干预,但不能彻底解决此问题,质量安全的主责在于企业,企业应遵循质量领域的法律法规、强化质量管理、不断追求品牌创新;企业认为,“质量赤字”是工业化水平相对滞后及市场和行业的不规范造成的,以逐利为导向的市场缺陷和政府监管不力、服务不周的政府失责才是根源;社会大众认为,其自身只是质量安全的终端消费者,质量事件频发和高质量服务无法获得的最终原因,既因企业“没良心”“没水平”,也因政府“不作为”“乱作为”。

整体来看,政府的质量安全职能定位与市场调配、社会参与还未能合理匹配,政府的质量管理过于微观化、行政化,挤占了本应由市场或社会承担的责任空间,造成质量共治中的市场与社会主体动力不足。而质量保障和质量发展的社会组织还不成熟^[32],质量安全的行业自律及其规范较为薄弱,“有事靠政府”的社会心理比较突出,多方主体协同的质量安全共治格局还未形成。

三、新发展格局理念下的质量安全提升路径

(一)战略定位:将质量安全纳入新发展格局通盘战略

将质量安全纳入国家战略是发达质量经济体的普遍做法。“德国制造”的崛起也是德国现代化和国家崛起的过程:德国将1887年8月23日设为“耻辱日”,^④以逼迫德国政府和民众奋发图强,为摆脱来自本国劣质产品的困局,经过百年的砥砺前行,21世纪最终实现德国制造“从‘厚颜无耻’到‘光荣之源’”^[33]的飞跃。近年,德国还通过《高技术战略2020》《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Industrie4.0)战略的建议》等国家举动开启工业4.0(Industrie4.0),推动基于信息物理系统(CPS)、人一机一产品实时联通、智能感知的智能制造,以先进制造业的智能化带动国家经济的自动化、数字化、个性化和参与化^[34],最终建立德国在国际标准、计量、合格评定领域不可置疑的话语权,^⑤德国作为“质量帝国”,正引领着全球质量提升的航向。19世纪80年代,美国根据日本高质量产品将“和平占领美国”的时局,毅然推出“强化质量意识运动”(1982)、《质量振兴法案》(1987)等,^⑥而2009年至今实施的连环“再工业化”“制造业复兴”举措是美国对20世纪80年代起因虚拟经济不断膨胀而导致次贷危机,以及为削减贸易赤字和提高就业率的根本反思^[35]。日本经济的腾飞也是一场“质量革命”的成功:二战后日本为快速实现国家现代化转型,19世纪60年代提出“质量救国”战略,70年代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决心从资源消耗型的数量增长转向知识密集型的质量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再次逼迫日本更改经济发展战略,2009—2012年实施5轮经济振兴计划,2013年又推出以产业再兴为重点的“日本复兴战略”,21世纪将“重振战略制造业”定为将日本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之困的“经济复兴战略”^[36]。综观之,德美日

对来自国内外的质量安全风险和压力保持着敏锐洞察和快速响应,并从国富民强和国际竞争的战略全局来定位质量安全这一重要议题。

我国已具有了质量安全战略的意愿和初步行动,如在《质量振兴纲要(1996年—2010年)》的基础上推出《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发布《中国制造2025》及其行动计划,凝练“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的目标与具体内容,研究制定《质量促进法》等。^⑦然而,《中国制造2025》本质上仅仅是一个政策力度更大的传统产业政策^[37],未能对我国制造业的能力结构及其发展方向进行着力解析,且围绕质量振兴、质量发展、质量提升的行动过多局限于经济考量,离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和高质量发展还有差距。

保证质量安全要紧结合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设定,对我国质量安全战略的目标定位、未来图景、主导目标、主要任务、责任与实施等进行全新规划。要与国家相关战略紧密对接:将《中国制造2025》《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质量促进法》等战略或规划有机融入高质量发展的通盘规划中,将“质量”(而非“数量”“规模”“速度”等)作为衡量新发展格局的价值内涵与发展意义的新维度,突出质量安全对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基石”意义。注重质量安全战略与国家创新驱动、工业发展规划、互联网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的匹配推进。

(二)质量行动:推进质量安全的战略行动

一是探索建立质量安全行动小组。质量安全战略要十分注重与政府的体制机制和职能调整,并与《国家安全战略实施纲要》、国家创新驱动、工业发展规划、“互联网+”等重大国家战略实施匹配推进。可探索建立由市场总局、发改委、工信部、食药总局、外交部、商务部等关涉部门组成的“质量安全行动小组”,该小组应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独立、专门任务小组,负

责及时有效对接国家安全战略制定及其实施,并统筹协调和研究制定我国质量安全战略的整体目标、具体任务、突破重点、保障体系等核心问题。

二是全面推进质量安全行动。要借力当前高质量发展改革的方向与势能,将质量安全的制度供给改革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内容。将不同层面与领域的质量安全行动(如机构调整、制度创新、工艺改进、管理探索等)作为国家治理转型的有益探索,创造积极政策以支持和鼓励地方公共性、社会性和市场性力量的质量提升活动,形成优质品牌、创意、工艺、技术、产品等不断涌现的质量氛围。通过整个国家与社会对“有质量”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的追求,来推动“有质量的GDP”。将“质量强省”“质量强市”纳入地方“GDP质量指数”考核,推动形成质量和效益优先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质量促进法》^①,以规范政府、企业、质量技术机构、社会团体和消费者等社会主体关于质量方面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实施质量激励等措施,提高产品、服务、环境等质量水平。

三是要逐步完善质量数据主权保护及重特大质量安全风险防控和突发事件处置制度。针对基于工业控制系统的现代制造业战略数据资源,以及国家质量技术基础设施(NQI)的关键基础数据,我国应有高度敏感的数据主权意识、制度和战略。与我国关联紧密的国家和区域的行业、标准、技术等数据,国家要善于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进行跟踪、分类与记录,尤其对关键敏感领域和基础民生领域的质量数据,要实时记录和保护。要建立不同区域、行业的关键产品、产业(集群)的国内发展及其走出去动态的大数据库,并建立智能分析系统,以保障有能力对重特大质量安全风险和突发事件进行预判与防控。要进一步完善质量监管数据库,将企业产品的质量数据、民众使用反馈和建议、国家要求、国际标准等与质量相关的各类数据都纳入

其中,使产品从生产到消费都可追根溯源,进而形成国家宏观调控、企业市场导向、社会参与监督的合力,以保障和提升产品质量。

(三)技术支撑:加强国家质量技术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质量技术基础设施(NQI)是“世界通用的技术语言”,是维护消费者权益、提高企业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柱,在实施质量安全战略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研究表明,标准化对德、法、英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达27%、23%和12%;美国超过80%的全球贸易受标准化影响,超过80%的常规贸易需经计量才能实现,工业发达国家的计量活动对GDP的贡献率为4%—6%,英国认可服务行业每年产生6亿英镑的附加经济效益。此外,NQI相关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也愈加显著,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已拥有165个成员国,成员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98%、经济占全球GDP的97%,制定了近3万项国际标准。当前,德、美、日等国的制造升级行动开启了一个全球范围的“质量时代”,质量、标准、合格评定等关键内容及其规则权,成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要素。相比之下,我国存在NQI的法律法规标准低、覆盖面窄、国际话语权不足等问题。

基于上述现状,一要将NQI纳入国家战略。将NQI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程,写入党和政府的工作报告,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推进“标准化+”行动。二要完善NQI的法律法规。尽快修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将认证认可条例上升为法律。三要优化NQI管理体制机制。要推进我国NQI统一管理与分行业分层级管理相结合、中央管理与地方跨部门协调相结合的改革,推进公共性与经营性NQI相配合、国家强制标准与企业标准相配套、推荐性标准与团体性标准互相推动的国

内国际对接顺畅与政府主导、市场驱动、社会推动相协调的 NQI 发展布局。四要推进 NQI 技术创新。要紧扣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和经济建设重点领域的需求,依托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国家现代先进测量体系,完善国家量值传递溯源体系,建立标准实施信息反馈和评估机制,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检验检测认证支撑能力。

(四)质量共治:“政产学研社用”六方协同的“质量安全共治”

一是共建“质量安全共同体”格局,即政府要合理界定质量管控职责边界,通过立法、执法与司法对企业性和社会性的质量供给与管理实施规制、管理和服务,通过政策引导建设更加规范的市场环境和自觉的社会环境。政府要积极引导落后企业退出市场,供给过剩企业减少产能,并将有限的政府资源分配给更具发展潜力的企业。企业对质量的生产与供给担负主体责任,遵循市场竞争规律、政府管控和社会反馈逻辑,持续创新、追求优质。同时,要时刻保持创新意识,加大创新投入,采用多样化的生产方式,加快产品研发,引进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以“质”取胜。社会主体(如消费者与行业协会)对质量的生产、供给及政府监管的全过程进行自觉反馈与监督,通过质量消费的终端行为形成倒逼质量安全提升的压力和引导质量安全提升的拉力。国际(国家和非国家)主体积极推进质量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质量成果交流与共享,共同承担全球性质量安全风险,共同处理全球重大质量安全事件,共同建设“质量安全共同体”。

二是在全社会营造自觉自为的质量安全文化。质量安全文化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整体质量精神、质量状态和质量追求。应制定政策以鼓励不同层面与领域的质量安全行动(如机构调整、制度创新、工艺改进、管理探索等),形成优质的品牌、创意、工艺、技术、产品等不断涌现的

质量氛围。弘扬劳模精神,培育匠人文化,营造精益求精、至臻至善的敬业风气,将追求更高质量内化为一种职场自觉。通过整个国家与社会对“有质量”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的追求,在全社会营造“质量第一”“质量是生命”“安全是底线”的质量安全意识,形成公共部门、市场主体、社会大众“不谈质量而坚守质量”的“质量自觉”,培育“人人重视质量、人人创造质量、人人享受质量”的“质量自为”,共建共享“质量安全型”的经济、社会和国家。

三是要积极开展质量安全的国际竞合,提高我国质量安全的话语权、主动权。坚定维护质量安全是世界的共同责任、质量安全是世界的共同事业的立场。首先,积极、主动且创造性地介入全球性和区域性的质量规则制定过程。如针对我国 NQI 国际话语权匮乏的现状,要紧密切关注全球重大规则变动(如美政府对华技术动态、国际贸易规则新动态),及时掌握技术、标准、合格评定的国际新动向。加强对发达经济体的支柱性产品、产业(集群)的跟踪与分析,通过高层访谈、技术观摩和团队交流等,突破国外技术封锁,积极推动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衔接。针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领域产品,应推动质量互信和标准互认。其次,主动争取与主导话语权。要在“一带一路”建设带动的全球经贸合作势能下,从被动应对规则的执行者逐渐转变为主动参与和主导建设的规则引领者^[38]。要充分利用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电信联盟(ITU)、国际认可论坛(IAF)等国际性质量组织中的主席/秘书处的身份,以及全球经济与安全治理中的倡议/组织者的角色,增强我国在全球质量安全场域中的影响力、主导权和话语权。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大亚洲区域治理”、自贸区发展等跨国行动中,争取建立符合我国发展需要的区域性质量、标准与规则体系。再次,强力反制与超越霸权行径。如

针对进口农产品、食品、工业成品质量,要严守国门质量安全关^[39];针对禁止入境产(物)品、贸易壁垒甚至“贸易战”问题,应自信回应、依法处理、巧妙回击;针对西方国家将中国质量问题政治化、“伪劣产品中国造”的“标签党”行为、个别国家“质量霸权”行为要自信反制与超越。比如,2003年我国就率先提出无线局域网的鉴别和保密基础结构(WAPI)的安全标准,但在提出国际标准提案后,美国强力阻挠并在以英特尔技术为基础的技术方案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提出国际标准提案,市场、海关、外交等相关涉及部门应共同研究制定反制举措,维护我国正当的质量安全利益。

习近平指出,“质量体现着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结晶,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40]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立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要通过质量安全的组合拳,增强质量安全优势,既为我国人民提供高质量的发展成果,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加优质的“中国质量”。

[注释]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5年7月1日开始实施。
- ② 我国对“质量”重要性的定位逐步提升。《质量振兴纲要(1996年—2010年)》指出:“质量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战略问题……,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则认为,“质量发展是兴国之道、强国之策……,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质量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关系可持续发展,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国家形象。”
- ③ 本文对质量安全关键词的共现分析方法是:在中国知网中以“质量安全”为关键词、将时间限定在2013—2022年十年间,共检索到4774条文献记录,为确保文献来源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将文献来源类别限定为SCI、CSSCI、北大核心三种,由此选出453条文献记录,将其下载并导入CiteSpace软件,据此对质量安全的研究热点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
- ④ 1887年8月23日,英国出台《商标法案》,规定所有从德国进口的产品都要注明“德国制造”,用以将劣质的德国货与优质的英国产品区分开来。该日被德国设定为“耻

辱日”。

- ⑤ 目前,德国承担的国家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秘书处数量达165个,居世界第一,占领了国际标准制定的制高点。
- ⑥ 克林顿认为,“《质量振兴法案》在使美国恢复经济活力以及在提升美国国家竞争力和生活质量等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唐晓芬:《不断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经济日报》2011年9月19日第14版。
- ⑦ 在2016年的两会上,关于推进质量促进立法的议案、提案共21件。2016年初,原国家质检总局与北京大学法学院质量与法治研究所启动《质量促进法》的立法研究工作。2018年两会代表也提出要制定《质量促进法》。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2021-11-17.
- [2] Baldwin D A, Milner H V. Econom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A]//Bienened H. Power, economics, and security[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29.
- [3] 刘跃进,主编. 国家安全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51.
- [4] 陆忠伟,主编. 非传统安全论[M].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15.
- [5] 丛鹏,主编. 大国安全观比较[M].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5.
- [6] Harold B. Thinking about national security [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3: 14.
- [7] 李少军. 国际政治学概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69.
- [8] [俄]A·X·沙瓦耶夫. 国家安全新论[M]. 魏世举,等译.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25-29.
- [9] [英]巴瑞·布赞,[丹]奥利·维夫,[丹]迪·怀尔德. 新安全论[M]. 朱宁,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43.
- [10] 杨毅. 国家安全战略理论[M].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11-12.
- [11] 刘跃进.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J]. 国际安全研究,2014(6):3-25,151.
- [12] 余潇枫. 中国未来安全的重要议题:质量安全:兼谈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贡献与完善[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8):52-60.
- [13] 我国制造业每年因质量问题造成损失达1700多亿[EB/OL]. 中国传动网, <https://www.chuandong.com/news/news168674.html>.

- [14] 李太平,薄慧敏,聂文静. 中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效率评价研究:基于政绩考核压力下的抽检批次分配视角[J]. 宏观质量研究,2021(6):86-98.
- [15] 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 2019[EB/OL]. 中国旅游研究院, <http://www.ctaweb.org.cn/cta/xsjl/202103/7850b35ec42d48cea8d0ef5a7d12049c.shtml>.
- [16] 2019年旅游市场基本情况[EB/OL]. 中国旅游研究院, <http://www.ctaweb.org.cn/cta/gzdt/202103/e42e7b98891c4098ad3da695dc856724.shtml>.
- [17] 中国出境旅游发展报告 2020[EB/OL]. 中国旅游研究院, <http://www.ctaweb.org.cn/cta/ztyj/202103/87a492a44eda4038b7fe8f6428ed3d5d.shtml>.
- [18] 2020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EB/OL]. 中国消费者协会, <https://www.cca.org.cn/tsdh/detail/29923.html>. //2021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EB/OL]. 中国质量新闻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3207530295733904&wfr=spider&for=pc>.
- [19] 国家质检总局办公厅. 探索之路:中国特色质检工作理论体系研究报告[M]. 北京:中国质检出版社,2014.
- [20] 廖丹子,叶东辉,钱显明.“质量时代”口岸进出口产品质量安全:挑战与规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40-257.
- [21] 一直在增长! 我国 2020 年粗钢产量 10.53 亿吨[EB/OL]. 兰格钢铁网, <https://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indu/2021-01-19/doc-iktssan8152527.shtml>.
- [22]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2》和《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2》蓝皮书发布[EB/OL]. 央广网, https://finance.cnr.cn/ycbd/20221109/t20221109_526055505.shtml.
- [23] 黄鑫. 制造业加速向服务化转型[N]. 经济日报,2016-07-28.
-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202/t20220228_1827971.html.
- [25]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http://www.cnnic.cn/NMediaFile/2022/0926/MAIN1664183425619U2MS433V3V.pdf>.
- [26] 姚树洁,张帆. 区域经济均衡高质量发展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J]. 宏观质量研究,2021(6):1-16.
- [27] 廖丹子,卢厚林. 质量变革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J]. 中国检验检疫,2018(5):66-68.
- [28] 龙海波,廖丹子. 全球“质量时代”亟待加强国家质量技术基础设施建设[N]. 经济参考报,2018-04-04.
- [29] 余潇枫,潘临灵,卢厚林.“质量悖论”:社会治理的“怪圈”与“语境”[J]. 领导科学,2017(10):20.
- [30] 程虹. 2012 年中国质量状况:消费者感知与模型构建[J]. 宏观质量研究,2013(1):33-48.
- [31] 罗连发,陈昕洲,李艳红,等. 2013 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J]. 宏观质量研究,2014(2):11-27.
- [32] 程虹,李艳红. 质量:新常态下的新动力:基于 2014 年宏观质量观测数据的实证分析[J]. 宏观质量研究,2015(1):56-66.
- [33] 纪双城,丁大伟. 125 年:“德国制造”由劣到强[J]. 中国品牌,2012(10):92-94.
- [34] 黄阳华. 德国“工业 4.0”计划及其对我国产业创新的启示[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2):1-10.
- [35] 贺正楚,潘红玉. 德国“工业 4.0”与“中国制造 2025”[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03-110.
- [36] 刘明达,顾强. 从供给侧改革看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发展: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1):19-29.
- [37] 黄群慧,贺俊. 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兼评《中国制造 2025》[J]. 中国工业经济,2015(6):5-17.
- [38] 石静霞. 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再构建及中国的因应[J]. 中国社会科学,2015(9):128-145,206.
- [39] 余潇枫,赵振拴,廖丹子,编. 从“国门安全”到“场域安全”:出入境检验检疫的非传统安全分析[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221-269.
- [40] 习近平向第二届中国质量(上海)大会致贺信[EB/OL]. 新华社, http://www.gov.cn/xinwen/2017-09/15/content_5225265.htm.